

■新作聚焦

张者《天边》:

每一片叶子上都写着故事,那是生命的奇迹

□杨辉

重读张者的长篇小说《天边》,兴会感发的,仍是书中蕴积的一股沉雄、朴拙的浩荡之气。此气刚健、正大,浩然、沛然,如风行水上,大地回春,万事万物皆因之有了生机和活力。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为浩然,沛乎塞苍冥。《天边》之气之象,约略与此相通。此气既可表征“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创化之意,亦是人感应天地消息所勉力完成的人事独异创造。故而时大时小,时刚时柔,甚或有正有“谐”,也就是谐趣、喜感或幽默感,是在颇为艰难的日常生活进行过程中人物创造力的另一种表达。此气亦是文气,是文章内蕴的一股气力,流行于吟咏之际,鼓荡于文辞之间,教文章元气淋漓,生机充满也。

“有情”与“事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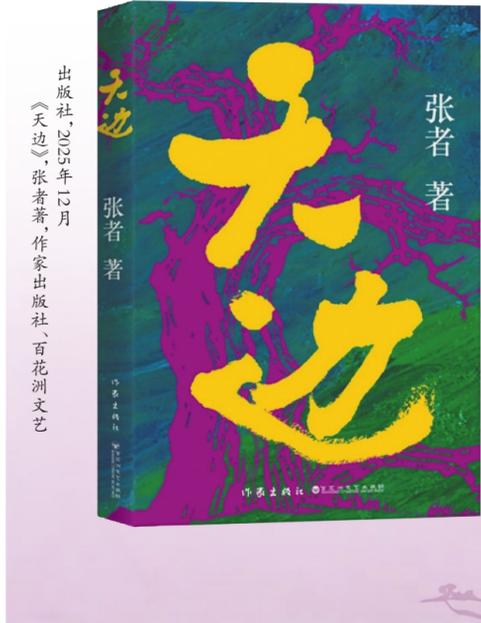
《天边》中的生机和活力,首先体现在生活世界创造性实践过程中所显发的人的不息的创造力——既是朝向外部的生活创造,亦是向内的自我创造,不可截然二分,故而书中多有“有情”与“事功”的复杂辩证,既写若干人物的精神史、心灵史和情感史,亦写其所参与的宏阔的生活世界的创造史。此种创造在多重意义上构成全书叙述的重心——从“一碗泉”,到“四十四”,再扩大到新疆的整体建设。全书以生活艰难心仪远方(天边)的少年八分,也就是后来功业显赫的重要人物姚远,背井离乡踏上西去的列车起笔,不疾不徐、不蔓不枝地从叙述兵团两代人数十年中堪称艰苦卓绝的生活创造。虽多虚写而少实写,晚近50余年间事关国家的重要事件,书中皆有呈现,偶或详细铺陈,时常一笔带过,或只是人物情感和生活创造的颇为遥远的背景,但皆以或隐或现的方式影响甚至形塑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事功”的创造大矣难矣,由之或限制或成就的人物命运的起落更是叫人心动。“有情”的声音回荡其间,如山之有云,树之有风,虚实显隐之间,分外具有摇曳多姿、动静合宜之趣。

“有情”激荡的是人对外部世界的情动时刻。可以对浩渺无边的天地之大美有情,如作品结尾处姚远、黄建疆、曲音等人进入大漠深处,因与一股惊心动魄的沙暴遭遇而体悟天地浩荡之气无言之美并为之心醉神迷;可以对绿洲中显发的勃勃生机有情,此类细节可谓多矣;自然也可以对亲人、朋友和爱人有情。杨沪生对女友王筱洁的痴情,以及作为理想爱情的信物的雪莲的开落皆有趣味;姚远对吴珍的如慕少艾,黄建疆对李晴碧和李么妹的情感,甚至刘明德与吴珍母亲的结合,皆生动鲜活,可圈可点,乃书中动人之处。个人和家庭情感为“有情”之小者,其大者为人所倾心参与的生活创造。故而《天边》中的“有情”,非是在“事功”之外别开一路,以“有情”补偿“事功”之缺憾,而是“有情”创造了“事功”,“事功”也成就了“有情”,二者在最高的意义上浑融为一。

由“近”及“远”

“事功”与“有情”交互创造的理想之境,是从根本意义上消弭“远”“近”之辨。远是远方,被认作是理想和诗得以成就之所;近则是此地此时此刻,是需要逃离或超克的对象。“生活在别处”为远近之辨颇为典型的表达。“远”很多时候仅具虚拟的形而上意义,并非也难以实指。从姚远、姚远的老家河南驻马店看,“一碗泉”或者天山边上皆是“天边”(远方)。但在姚远、黄建疆、李军垦等兵团二代人的青春记忆里,足以容纳诗与远方的是杨沪生叙述中的上海,也是姚远读书的成都,或者其他存在物理空间的距离而在想象世界里无比美好的地方。比如,李军垦始终心心念念的胡一桂连长和阿依古丽曾经寄身的类似桃花源的理想之地达里雅布依村。当此之际,在年轻人的想象中,美好生活皆在别处、在远方,吸引着他们生出逃离之心。黄建疆等人一度心里皆是如此,但他们最终都将目光投向现实,在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中完成美好生活的创造。此为《天边》的根本意义所在。

“天边”何在?既在“天山边上”,亦在上海抑或另一处可以承载青春想象的地方,最终却在此时此地,在兵团两代人奋力创造的新的生活世界之中。这种由远及近,由虚拟到实存观念的转变,类乎歌德《浮士德》中如下箴言所昭示的思想:“精神既不瞻前也不顾后,唯有当下是我们的幸



福。”“当下”既是马富贵、胡一桂、姚桂喜奋力于生活创造的年代,亦是姚远、黄建疆、李军垦生活和创造的年代,是他们共同居所的极具象征意味的“一碗泉”。有此转变,方有《天边》所述兵团人半个多世纪中堪称艰苦卓绝也动人心魄的生活创造,方能理解第一代兵团人喊出“我为边疆献青春,我为青春献子孙”的真正意义,方能理解他们以青春与热血扎根边疆,以超强的意志攻坚克难,不断奋斗创造美好生活的精神力量所在。

《天边》较少着墨写“一碗泉”抑或兵团人日常生活的艰难,或因在后来的追忆之中,似水年华皆着一层理想的色彩,有青春丰沛、蓬勃的想象力所彰显的精神的灵韵,那日常的艰难底色因之淡去。杨沪生为心爱之人描述的雪莲花美得不可方物,然而在雪莲花开放的地方,日常生活却充满艰难。“沙漠和绿洲只有一步之遥。在绿洲和沙漠之间有一条沟渠,沟渠随时有可能被沙漠吞噬。这是兵团人的生命渠,要不断地清淤,才能让渠水愉快地流淌。”而人站在沙丘上远望,“大漠广阔无边,沙丘连绵不绝,就像前赴后继的海浪”。那海浪没有涛声,也没有“海鸟劈波展翅的飞翔。天地沉默不语,万物寂寥无声。那种广阔的‘无’却比‘有’更能震撼人心、摄人魂魄”。那是姚远、黄建疆和李军垦的晨读之地,而“面对死亡之海的晨读”,是需要勇气的。置身沙漠瀚海之外,远观感受已是如此震人心魄,遑论与沙漠角力的生活创造难以言喻之难。如书中写六月里稻田拔草时,源自天山的雪水仍寒冷刺骨,导致“兵团一代”年长之后几乎人人身患顽疾(老寒腿);居住在“四十四”的建设者连日常饮水也存在困难,日常作业亦不乏危险。吴珍的父亲吴之森此前虽屡屡受挫甚至一度有轻生之念,但仍顽强活着,没想到却在检查炮眼时不幸被炸身亡,去了五十五连。五十五连并非实指,而是兵团人的埋骨之所。“这种墓地,在每一个团都会有。”“如果你去了解有多少兵团人埋在了戈壁滩上,你可以站在高处看,肯定一眼望不到边的。”语虽简略,用心之深之痛,不难察觉。

以“轻”化“重”

《天边》的谐趣抑或喜感,正在于以“轻”化“重”,或曰以精神所蕴积的不息的创造力让物质世界中难以承受之重焕发异彩。颇为典型的例证,便是黄建疆、姚远等人在“四十四”合影留念时所呈现的虚实相映的境界。其时水泥熟料池中蒸汽腾腾,人无法也不敢靠近,但在照片所呈现的虚拟之境中,近在咫尺的危险不复存在,反倒如云蒸霞蔚,似祥云缭绕,呈现出一种诗意的、引人入胜的氛围,使局外旁观者向往之。《天边》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善于以

《天边》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两代人数十年生产生活为核心,辩证书写“有情”与“事功”的相融共生:既有个人情感与心灵史的书写,也展现新疆建设的宏阔历程与家国记忆。人物从向往远方、执着“天边”之梦,最终回归当下,在扎根边疆、攻坚克难中实现理想。作品以“轻”化“重”,用谐趣、音乐与诗意化解生存之重,歌颂兵团人奉献坚守、自强不息的生命传奇,彰显天地大美与民族精神共同体的深厚底蕴

轻逸之笔提升甚至化解日常生活尤其是辛苦劳作之困之累。除了凭借人物的幽默感以及浪漫情怀外,还有极具地域和民族特色的音乐营造的美妙境界。《天边》之中,时常有音乐响起,大家耳熟能详的新疆民歌姑且不论,书中还写到龟兹古乐的重要乐器巴拉曼皮,写姚远从中体会到的深具意味的古今相通之境。当巴拉曼皮或其他民族乐器的曲声响起,为艰苦的劳作所困所苦的人们瞬间便可以感通古今相接、人与万物共在共生的境界。“乐者,天地之和也。”由之创造的精神和情感氛围具有极大的统摄力量,无论男女老幼,也不管他身处何境,皆可因之升腾、因之超迈也因之得窥精神的向上一路。《天边》详述“一碗泉”及其周边深厚的历史积淀,深描其丰富的文化底蕴,细写构建民族精神共同体的重要意义,境界庶几近之。

乙巳年秋八月,在美丽的可克达拉城外,天宽地阔,山风过耳,隐约有歌声响起,而眼前宽阔的伊犁河静静地流过,蜿蜒曲折,如路亦如带,渐行渐远,上与天接。时近黄昏,乌孙山头落日熔金,为霞满天,光芒万丈,此乃天地之大美,让人胸怀大畅。稍后霞光褪去,乐声渐大,细细听来,乃是《草原之夜》,柔肠百转,满怀情意,其词曰:“等到千里雪消融/等到草原上送来春风/可克达拉改变了模样/姑娘就会来伴我的琴声……”琴声悠扬,婉转动人,教人顿觉置身《天边》的世界:有风起于大漠,风之动物,心亦摇曳,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蹈之也。

书中还有一首歌,为曲音所作,或为点睛之笔:“胡杨泪已流干,眼泪洒满荒原。满身的眼睛都在眺望……那些被风刮走的孩子呀,何时才能还回?眼泪飘洒在风里,每一滴都有故事,在天边的旷野里,你是唯一的传奇。”这一日姚远和曲音来到他曾经晨读的那一座沙包上,眼前是茫茫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身后则是三十八连两代人共同创造的绿洲,在天地之间,自然与人事角力之地,抚今追昔,曲音身心为之激荡,以琵琶和姚远合奏,创作出了这首《胡杨泪》。此曲所咏虽为在大漠中以生命力顽强著称的胡杨,但将之解作对兵团人创造精神的赞歌,也未为不可。(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 LITERATURE SUMMIT PLAN FOR A NEW ERA

文学名刊 近作扫描

信息技术使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变得便捷,也让真实的相遇显得愈发珍贵。时代的长风推动个体在广阔天地间各奔前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与陌生感也悄然滋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每一次人与人的相逢、碰撞、驻足,便成为消解疏离、拥抱真实的重要路径。2026年新春,《钟山》《江南》《山花》《福建文学》《湖南文学》《长江文艺》等文学期刊不约而同地关注和记录着那萍水相逢的疏离感、久别重逢的怅惘,乃至自我体认的颗粒感,以文学之名叩问“人生何处不相逢”的真谛,探讨在鲍曼所言“流动的现时性”之中,人与人、人与自我重建联结的可能性。

在传统社群逐渐消解、熟人社会成为过往的当下,“萍水相逢”成为人际联结中最普遍也最常见的形态。也可以说,每一次素昧平生的相遇,都展现出现代人际关系的真实样貌,映照看当代人的精神岩层。杨不易《短巷》(《福建文学》2026年第1期)与叶弥《没有乡愁的男孩》(《山花》2026年第1期)同时以租住关系为切口,将目光投向了漂泊无依的现代人。搬家是多数人必经的难题,住所的挪动意味着原有社会联系的间歇性中断,而在新住所落脚,又意味着个体接触新的社群、重构自我认同的可能。《短巷》中,未婚的中年男人余树整日守着父母留下的老屋经营彩票店,将自己困于愁绪深处;单亲母亲王琦租住于此,每日早出晚归,在保险公司与短巷之间疲于奔命。两人隔墙而居,互不打扰,却在日复一日的沉默相伴中构成彼此的守护。《没有乡愁的男孩》则以两代人迥异的“乡愁观”为核心,“我”是在城里工作的小学教师,将承载乡愁的乡间老屋租给从四川来的青年黄若晨。与“我”截然不同的,黄若晨对遥远的故土不甚牵挂,却将精神驻足于未来的虚空当中,执意要去追寻太空的声音。短暂的相遇和告别,背后是陌生人之间的理解和尊重。

真实的相遇为何逐渐稀缺,或许在于,当我们试图走近他人的生命,迎来的未必是相互温暖与彼此慰藉,反而是难以言说的复杂与痛感。也正因此,当下的世界看客成群,真正相知相契的知己愈发难寻。谭滢的《鼠》(《江南》2026年第1期),便书写了这样一段极痛感又异常深刻的相遇。婚介所职员杨力与客户罗茵因一次线下见面,继而打开了各自生命的“匣子”,触碰到彼此粗砺的人生切面:杨力在重复婚恋话术与备考编制的压力间挣扎,而她也看到了从话剧表演的罗茵在养老院照料与夜班奔波间尽显的疲态。小说用“鼠”所隐喻的生存境遇,照见个体在严格社会分工中的艰难与沉重。如此相遇,固然可以成为救赎,又何尝不是一道无形的枷锁?

当历史的纵深汇入现实的轨道,故人的相遇唤醒了被时间沉淀的爱与恨。这样的别后重逢,便不只是美好的重逢,而更可能是对过往痛苦的反思,是时间回纹带来的二次伤害。喻之之《端午节的第二天》(《湖南文学》2026年第1期)中,孙继红为烧伤的嫂子讨要医药费,与推诿的校长周旋时,哥哥孙继国的往事随之浮现:那个遵章守纪、节俭严苛的乡村教师,因为错过“买编制”的时代机缘,一生困顿,最终病逝。凡一平《苍蝇》(《长江文艺》2026年第2期)中,韦青光凭借自身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在“模拟签证官”这个岗位上干得风生水起,而他与老师的女儿覃虹相遇并否定她留美的选择背后,藏着她留美被驱逐后漂泊困顿的惨痛经历,是一场异域想象彻底落空后艰难的人生困局。在此语境下,重逢褪去了叙旧背后的温暖底色,让被时间尘封的苦难重新显形。

而当目光从故人转向至亲之时,也会发现,血缘赋予我们最天然的亲密,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中,却也常常构成最不易察觉的遮蔽。我们惯以“亲情”之名,将一切理解为天然的联结,却忽略了家人之间同样需要艰难而持续的相互体认。家庭,是我们亲密的栖身之所,又何尝不是最难穿透的“关系灰色地带”?伍倩《咏而归》、曹译《春晖》(《江南》2026年第1期)、杨绍斌《墙壁里的孩子》(《山花》2026年第1期)、王晓燕《杏子的甜味》(《长江文艺》2026年第2期)等作品以家庭关系为叙述核心,共同揭示出:在家庭中,我们每天“相遇”,却又从未真正“遇见”。《咏而归》中,大学教师父亲以刚正不阿的姿态将儿子自小困于“小黑屋”“豆瓣酱”“论语”等古典规训之中。然而,儿子恰恰在这套教育中习得了话语与权力的逻辑,活成了父亲最鄙夷的样子。直至父亲患上阿尔茨海默病,往日的刚正与清高在失序、混沌中彻底崩塌,儿子才与父亲混沌的呓语里,接住了那句藏着迟来温情中的“彼彼童分,不与我好分”。杨绍斌《墙壁里的孩子》以荒诞的笔法书写了内核相近的故事。父亲带着五个患有侏儒症的孩子从南方迁徙至北方,卡车却在途中发生意外。最小的孩子因为贪睡错过上车,成为唯一的幸存者。多年后,当他想起那些消失的亲人,真正领悟何为亲情的时刻,也是痛苦和悔恨的开始——他活了下来,却永远错过了与家人“相遇”的机会。

凡此种种,都在悄然拆解我们对“相遇”这一人际起点的浪漫想象。概而言之,那充满诗意的相逢,并不总是疗愈人心的,有时反而是虚妄的寄托。也正因此,人们常常以“人心难测”“人走茶凉”聊以自慰,以“人是一座孤岛”标榜所谓清醒与独立。但必须承认的是,只有不断地与陌生人相逢、与故人重逢、与亲人和解,我们才能不断认识、发现并深化自我。正是在那些破碎的、未完成的、令人失落的相遇中,我们照见自己的软弱与渴望。顾文艳《希望》(《钟山》2026年第1期)中的周宛桐,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接受父母的安排在大学有一份安稳工作,但她却不是典型意义上的“乖乖女”。她迷恋上小十几岁的排球运动员,试图通过走进他的生命,短暂感受自我与世界的联结。这是她在规定的人生里,用虚无反抗虚无,在虚妄中寻找喘息空间的无奈之举。又如夏群《洄游》(《湖南文学》2026年第1期)中,“我”在酒店房间发现带血的笔记本,通过阅读笔名为“川断”的文字,不断混淆现实与梦境、自我与他人:“我”看见襁褓中的自己被女人抱着,看见豁鼻子老牛产下明亮的小牛,看见自己一拳击中殴打母亲的父亲……这是“川断”记录的文学碎片,也是“我”困顿、痛苦和麻木的真实人生。由此可见,“人生何处不相逢”的命题,表面上是自我与周遭、近与远、内与外的关系命题,最终指向的却是自我体认和自我超越。文学让我们懂得:相遇的意义,不在于追寻圆满,而在于它让我们一次次地站在他人之镜前,看清自身的尘埃与光芒。(作者系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硕士生)

于他人之镜前,看清自身的尘与光

□盛雪

■新作快评

包丽芳小小小说《碾米》,《特区文学》2026年下半年刊第1期

贵在呈现生活真情实感

□余清平

河源女作家包丽芳的作品多数是于细微处呈现生活真情实感,温暖四溢,润物无声。她的近作《碾米》便是此类作品。一篇具有美学价值的小小说需要具备多样的元素,比如人物设计、作品的结构和情节走向、人性的呈现、事件的发生与结束,以及作品传递给读者的思考和感受等。可是,《碾米》没有刻意追求这种美学特质,正是没有因为刻意地追求,才成就了这篇作品的美学价值。《碾米》中的人物,主人公没有姓名,是以“我”“亲家”取代,还有其他人物“儿子”“儿媳”“老板”“我姐”等。故事情节并不跌宕起伏,讲述的是“我”为了碾米而四处奔走、到处碰壁,最终也没有把“一大包稻谷”碾成米,于是买来一袋米企图以假乱真,结果被亲家识破后被一顿数落。然而,返璞归真、大道至简,正是《碾米》的特色。这类作品粗读似觉无味,细嚼慢咽却是趣味无穷。

碾米在上世纪是很常见的事,作品里有细致的描写:“碾米过程中,老板手往漏斗一指,我妈就往漏斗里添谷;他指向出口、出糠口,然后我妈按部就班地把装米、碎米、细糠、粗糠、瘪谷的箩筐一一放好。”这些描写再现了那个时代的烟火生活。但是,令“我”想不到的是,时代的进步让许多事已是“沧海桑田”,过去常见的碾米如今在城里已经绝迹(乡下有些地方尚存在),导致“我”与一袋稻谷之间仿佛发生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以“我”不得不向现实妥协告终:“我”低价卖掉了稻谷,再去花高价买来一袋香米,才算结束了这场“碾米战争”。可是,假的终究是假的,“我”买来的上等籼米在火眼金睛的亲家眼里,哪里能够乱真?有读者可能会认为《碾米》是烟火生活中的鸡毛蒜皮,实则不然。孩子是家庭的未来,是长辈们的掌上明珠。亲家爱她的外孙女,因此带来新米让“我”煲粥给孩子吃。在农村,村民都有共识,大家认为新米最养人,即便买的米添加了各种营养成分,也比不上新米。作品中亲家喂宝贝吃粥时试温度的细节描写,也十分感人;“我”为了给孙女碾米,不厌其烦地四处奔波劳累也无怨无悔。作品通过亲家识出假新米的情节,传递出“假的就是假的,永远无法乱真”的道理。作品还写出了时代前行的步伐和发展变化。小说是虚构的艺术,但小说的题材来源于生活。《碾米》取材于现实中的日常片段,经过恰到好处的艺术提炼,更显示出打动人的力量。这种表面平淡、内里藏锋的叙事方式,避开了刻意的情节铺陈与道理说教,以朴素的语言传达深层含义,既保留了生活的温度,又能让读者获得别样的感悟与惊喜。(作者系广东省小小说学会常务副会长)